

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论证

——1949~1966年中国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

金进著



GEMINGLISHI DE HEFAXING LUNZHENG

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论证

——1949~1966年中国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

金 进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论证/金进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649-0407-4

I. ①革…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革命文学
— 文学研究—1949~1966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5021 号

责任编辑 靳宇峰

责任校对 言 午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公安厅文印中心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言

22年前,我发表过一篇论文《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讨论战争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的影响。记得当时写那篇论文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战争与文学之间关系的阐述,论证把抗战作为20世纪文学史分界的理由;二是研究1949~1976年期间的文学创作的教训究竟在哪里?那个时候一般的主流观点是批判极“左”路线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而我想进一步探讨,这些错误路线和错误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其源头在哪里,于是就关注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从抗战以来逐渐形成的全民族的战争文化心理。在这种文化心理的背景下,不仅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受其影响,就连整个治国大略也是在战争文化思维的支配下完成的。这就容易解释为什么1949年以后治理国家要采取大兵团作战似的一个“战役”连着一个“战役”,运动不断,批判不绝,自然国家对民生的杀伤力也是空前浩大的。

但我并不全盘否定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我以为在一个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里,人们即使昧于思想,伪于历史,愚于常识,但不会放弃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承担起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精神的标记。在中国古代,文人与民间相结合所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就体现了这样一个高度。但是在那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严厉控制,不可能独立存在文人创作(少数潜在写作除外),也不可能独立存在民间创作,而真正有活力的艺术因素是通过民间形式渗透到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创作中去,成为一种文本的隐形结构,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民歌、音乐舞蹈、民族绘画、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都含有这样的性质,这些作品的成功并非证明了意识形态,而是民间审美传统的潜在的胜利。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试图解释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于是我在1994年初发表了《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的文学史的一个解释》。

这两篇论文表达了我对那一段文学史的基本看法,也是后来(1999年)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基本出发点。学术界对于那一段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不够。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想占上风的时候,对那一段文学史基本上持贬低的态度(如“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学术思潮),到了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一股把“现代性”泛化的思潮泛滥,又有学者莫名其妙地赞美起那些文学作品,甚至美其名曰“红色经典”。我极不赞成这种不严肃的命名。文学史上的经典应该经过时间的考验,要由后世来证明,从来没有自封的经典,更加不会有短命的经典。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根本处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无论艺术的真实性还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真实性都没有达到,因此,不能因为个别人对于在极其贫乏时代的少数读者的自恋,就把它们赞美为“经典”。尽管那些文学创作中个别作品由于民间隐形结构发挥了喜闻乐见的艺术作用(如李準的电影《李双双》),或者曲折隐晦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良知的存在(如赵树理的小说),但基本上是在民间的意义上肯定它们的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页文学史会很快地翻过去,也是没有什么可惜的。

鉴于上述理解,我一般情况下不鼓励学生研究这段历史的文学。因为研究这段历史是要有条件的,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清醒透彻的认识,要对作品的艺术因素有分解剥离的能力,还要有准确表达感觉的理论功底。这对于一个远离那个时代的青年研究生来说太困难了。从90年代初开始,我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将近百篇,但是在金进撰写这部论文以前,竟未有指导过研究这个领域的论文(只有一篇研究潜在写作),所以也可以说,金进的这部论文是一个例外。倒也不是说他已经具备了上述诸种条件,只是金进从硕士阶段起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而且他攻读硕士学位的华中师范大学又是研究当代文学的学术重镇,导师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他选择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是顺理成章的。他把“1949~1966年中国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的讨论,定位于“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论证”,我认为也是比较准确的。尤其是在导论部分,作者简单回顾了中共中央从1941年10月成立了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开始,到延安整风前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的出版,最后形成了1945年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这对于我们了解后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状况,是十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可惜这一部分历史在论文里还只是匆匆带过,如果金进能够安下心来,潜心研究这段历史文献的产生过程以及文本的演变,就会对论文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和知识背景,有些问题也会把握得更加准确。

金进为撰写这部论文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表现在阅读和修改两个方面。这部论文研究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有些作品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土之中,五六十年前的文学作品要找起来也未必容易。记得有一次我与他讨论论文时,我随口说起,以前(指“文革”以前)曾读过两部

长篇小说，一部《江海奔腾》，是描写苏北解放区民兵的故事，还有一部《源泉》，是写改造解放战士的故事，但这两部作品好像都没有出过单行本，现在也很少有人提起。我读这两部小说时大约十二三岁，早已经忘记了在哪里读到的，也忘记了作者的名字，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我无心说了这么一种印象，但金进都已经找来读过，并写进了论文。我读了这部论文的上编，觉得作者材料梳理得比较清楚。因为他读作品的量比较多，所以显示出比较丰富的内涵，分析也比较全面。

金进在论文答辩完成以后，远走海外，在马来西亚任教职。近年我数度去马来西亚参加星州日报举办的花踪文学评奖活动，每一次去都与金进夫妇见面，我们谈的还是学术上的事情。我看他在海外生活的磨练下成长得很快，原先身上的孩子气明显少了，越来越成熟；同时也很繁忙，除了教书以外，他还转向研究马华文学，活跃在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但这一次我重读他的即将出版的论文，我发现他还是作了很多甚至很大的修改。看得出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段时间还打算将海峡两岸的战争题材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来讨论战争文化心理在海峡两岸不同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状况下，是如何对文学发生影响的。我觉得金进的路走得很好，只要这样不放松自己，不虚度光阴，不被世俗生活中太多的诱惑所驱使，慢慢地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道路来。

这部论文即将出版，金进希望我为这部著作写几句话权作序言。我想这部著作肯定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一来是金进自身修养的不足，二来是目前也不是研究这个题目的最佳时候，还有许多禁忌摆在那里，许多问题也无法说透。但这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愿意真诚地勉励金进，希望他能够在这条道路上一步步坚实地走下去。

陈思和

2010年6月19日于黑水斋

目 录

序 言	陈思和(1)
导 论 历史谱系的建构与演变	(1)
第一节 建构：“历史”中析出的“革命历史”	(3)
第二节 演变：难以超越的内在矛盾	(9)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本文论题	(17)

上 编

第一章 新旧民主革命之“别”	(27)
第一节 民间文化精神烛照下的民间文学	(37)
第二节 剧本中的“两类矛盾”	(41)
第三节 小说中的近代革新风潮	(51)
第二章 逃出围城的“灰阑”	(61)
第一节 早期城市斗争的描写	(64)
第二节 北伐战争在文本中的重忆	(73)
第三节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经历的文学作品	(78)
第三章 抗战烽火铸族魂	(85)
第一节 渗入民间的力量：关于战争初期的文学作品	(89)
第二节 消耗中坚持的精神：关于战争后期的文学作品	(95)
第三节 摩擦中的抗战：关于战争后期的文学作品	(102)
第四章 国共之间的正规战争	(107)
第一节 内战初期：同室操戈再起	(108)
第二节 转折时期：实力对比的大转换	(113)

第三节	决战中华:阅墙兄弟终有果	(117)
-----	--------------------	-------

下 编

第五章	遮蔽下的党内路线斗争	(127)
第一节	回避矛盾:被误读的《红旗谱》	(128)
第二节	图解矛盾:戳向党内“敌人”的“昙花”剧本	(134)
第三节	革命回忆录中被“胜利化”了的党内路线斗争	(140)
第六章	多舛的“第二条战线”	(146)
第一节	地下工作:带着伪装的战斗	(147)
第二节	谁是主角:小资产阶级身份的尴尬	(152)
第三节	挤兑下的彷徨:“第二条路线”(白区路线)之命运	(162)
第七章	人情人性的夭折	(169)
第一节	“英雄”的出现: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170)
第二节	“人性”的窄化:《黎明的河边》等小说	(179)
第三节	“夹缝”中的生存:《源泉》之谜	(186)
第八章	民间文化的隐性存在	(190)
第一节	“民间”的演变:从“五四”到“五六十年代”	(191)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浸染:准传奇体小说	(202)
第三节	新的道德情操:觉悟的群众及其他	(210)
余 论	当历史再遇上文学	(215)
参考文献	(218)
后 记	(223)

导论 历史谱系的建构与演变

革命历史题材是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66)的三大小说题材之一(另两个是农村题材小说和工业题材小说)。“革命历史”这一说法最终确定是在1959年,时逢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当时《文艺报》出了两期“国庆专号”,在各类总结性的文章中都提到与之类似的说法,如“我们的文学……还要求作家去描写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英勇的革命斗争过程”(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我们的文学作品不仅反映现代的人民革命斗争,而且也反映历史上的革命斗争”(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我们的受群众欢迎、得到流传、被认为是优秀的作品恰恰就是和革命政治结合在一起的,生动地深刻地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它们正是每一次革命运动的产物”(袁水拍《成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诗歌》)、“这些剧本,几乎将三十多年来我国革命斗争的各个重要阶段,都作了生动的反映,组成了动人的革命历史的画廊”(卞济远《十年话剧创作的成就令人鼓舞》)等等。“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也就渐渐浮出了水面并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称呼。

黄子平曾经这样界定过“革命历史小说”,认为“‘革命历史小说’,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话语中,专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创作的,以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①,在这个定义中,黄子平把“革命历史小说”的叙述内容限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28年历史过程,即叙述中国共产党如何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过程。在这里我对其概念进行一个拓展,将革命历史题材的范围向前溯,前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一概念是以陈思和的文学史理论为基础,陈思和认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点的叙事文学作品”^②。笔者将题材范围扩大还有三个原因:一个是笔者认同毛泽东关于新

①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旧民主主义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①可以看出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历史中发生的个别事件,如不同时段发生的变法革新和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进程是有连贯性的,在某一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是一致的;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是将自己的革命历史建立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爱国主义运动历史之中的,^②曾经也出现过一批主旋律的作品,如《林则徐》、《六十年的变迁》等作品。三是从文学作品的艺术虚构本质得出的。既然是革命的“历史”,毕竟还是要有一定的历史感,有一定的距离感,只有这样作家们在对革命斗争阶段的把握上,特别是以“后来者”身份对那些久远的革命历史进行叙述的时候,作家与历史更容易碰出艺术的火花,给我们展现出文学(作为“fiction”)反映现实独特艺术魅力。

其次我要界定的是本文中涉及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这种文学样式包含的主要内容。我研究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首先它是与“革命”相关的,必须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中与“革命”有关的事件,而且主要集中在各个具体的点上,即俗语所谓的风口浪尖处——新旧民主主义革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② 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动土兴建、1958年5月1日落成揭幕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上刻着周恩来用楷书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中就包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所有的革命历史,碑座的十块汉白玉大浮雕分别反映着中国近代历史以来的八个伟大的历史场景:《烧鸦片——鸦片战争》、《金田起义——太平天国》、《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游击战——抗日战争》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另两个浮雕的主题是《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中国革命历史文学构筑历史,构筑国家民族形象的努力的原点也就是从这个不朽的碑文开始的——即文学对历史的记忆必须首先选择碑文中的时间/事件。

命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从而凸显文学中“Revolution”的特征,是一种改变旧制度的“Revolution”。风行一时的土改小说,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也是描写解放战争历史的经典之作,因描写的只是革命运动中的非战争环节,是不包括在本文论述中的;其次本文所论及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更多的是与战争有关的,是一种反映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战争历史”的文学,其中相当数量的作品属于战争文学范畴。另外,那些在建国前已经出版,后来又在建国后重版的关于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在本文论述之列,这样以便更好地将本文的研究焦点聚集到五六十年代作家的创作上。

第一节 建构:“历史”中析出的“革命历史”

“任何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都需要借助叙述来争夺话语权和历史的阐释权,这可以通过以资料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和文件记录得以完成,但更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通过虚构的革命历史小说和反映一个大时代的社会建设小说,因为以文学形式出现的文本更贴近群众的阅读习惯,更容易达到‘化大众’的效果”,^①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对与自己历史切身相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建构,特别是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重塑革命历史的源头可以回溯到1941年10月,当时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委托王稼祥起草文件,“由于全党还没有开展整风,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上的错误在认识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毛泽东对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没有提交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②在延安整风前后,不满意研究现状的毛泽东开始亲自对党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先后汇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又将党成立以来22年中的137篇历史文献汇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于1943年10月出版,作为当时的高级领导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材料。为了让同志们真正理解这些历史文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作了一系列辅导性的报告。^③除了从理论

^①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② 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革命的道路·第二卷(1935~1945)》,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页。

^③ 除了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之外,还有周恩来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还有发表于1942年7月1日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朱德)、《伟大的二十年》(陈毅)。

上正本清源外,毛泽东通过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进行讨论,来为弄清其他各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问题提供范例。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同志一道参与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使之正确地总结了西北根据地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在路线问题上的争论,统一了认识。接着,中央又分别召开了几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使高级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在此基础上,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为期4年的中央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从1941年到1944年数年间,党内热烈地讨论,进行理论上的初步总结,同时这个讲演也是党内第一次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王明左倾路线的批判。讲演中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六条意见,作为党内最高机关的结论,成为后来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②《决议》的酝酿和最终诞生,第一次在党内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整地梳理自己自产生以来的历史,其中涉及对某些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些评价对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文学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框定着这些文学作品的叙事话语和文本内容,而《决议》的权威性对作家的精神影响更是毋庸置疑。

^① 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革命的道路·第二卷(1935~1945)》,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②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起草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决议》草案稿是在原王稼祥起草的《结论草案》的基础上进行的。任弼时作了修改,并加写了“(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一节。此后,胡乔木又起草了一个稿子,任弼时修改了三次,并加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张闻天也作了较多的修改和增补。1945年春,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和增补的抄写清样上进行了六次修改,在1944年4月8日最后一次修改之后,交1944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再经决议准备委员会研究,将合理的意见吸收于《决议》中。可以说,《决议》是经过长达四年的整风运动后,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后认识统一的产物,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实际上,重塑历史的过程普遍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的,接下来就是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①。从现存文本来看,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家很显然想通过他们的文艺作品重建一段历史记忆,李六如自诉创作目的是使“后代年轻朋友,更可以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吸取一些‘观今宜鉴古’的教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就是我改写这部小说的动机和愿望”^②,梁斌直言“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③,王愿坚曾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不重视自己的历史。他们都珍视历史,并把它尽可能广泛传扬,以证明这个民族和阶级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必要性。还要把它用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代,以保持和巩固前人和后辈的精神联系。”^④类似的表白在他们的创作谈中随处可见。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家们一直把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教谕功能强调得很厉害,意在书写一段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革命历史记忆,试图通过文学形式留住和追忆刚刚逝去的历史,并力图将这段历史按照政权的既定阐释去理解和描摹,写出人民政权的革命性、人民性和正确性,写出反动政权的腐朽不堪和必然灭亡,写出新政权的顺应民心 and 必然胜利;最终加深人民对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的认识,论证出新生的人民政权存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建国初期新文艺领导层就已经有目的地给作家们开列“阅读书目”,准备在理论资源和创作主题上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进行指导和规范:“这方面的历史文献和著作是异常丰富的。首先要举出的,就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还有毛主席在抗战时代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1938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论联合政府》1945年),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1945年),还有毛主席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以及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基本原则的《古田会议决议》等。‘七一’关于党史的许多论文,就是很好的学习材料。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还概述于

①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③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第17页。

④ 王愿坚:《军人·历史·诗情——在解放军文艺社军事题材短篇小说读书班的发言》,《解放军文艺》1980年12月号,第82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三年概述》和体现在1946年7月以来的有丰富内容和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战争形势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的军事文献中,更有各野战军丰富的战役战斗总结,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的情况和总结的文献,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人民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①,这就像一份“指定书目”一样,后来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主题基本上都被规限在这类政治文献中。

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前身是现代文学中的战争题材文学,现代文学中曾经出现过萧军、骆宾基、丘东平、路翎、孙犁等战争小说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影响着解放后的革命历史文学家,如峻青《黎明的河边》中的景物描写颇像丘东平的《暴风雨的一天》,郭小川的叙事诗《一个和八个》似乎也有着丘东平《一个连长的遭遇》的影子。另一个来源是基于解放前后一些参战部队的油印小报、壁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以新华社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为基础的报体文学,如陆柱国的《决斗》、刘白羽的《火光在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都是将一种“当下现实”转成“历史记忆”。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前解放区初具规模的新闻出版业也促使着一批通讯员、记者快速成长,“据《华商日报》的年鉴所载,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各种报纸在百种以上,这些报纸甚至在极小的地方都有自己的通讯员和工人通讯员,农村小学教师,文化工作者,都参加这些报纸的工作”^②。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傅钟在《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报告中就自豪地说“部队文艺工作的有领导、有组织,可以举报纸通讯工作为例”^③,许多活跃在新中国文坛上的主流作家,如杜鹏程、刘知侠、刘流等都做过战地记者或文工团演员,而像曲波、李英儒等人本身就是革命干部,总结报告和思想总结更是日常工作所需。如杜鹏程“延安撤退以后,不久,他担任了新闻记者,才第一次到部队工作。他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到了连队,上党课、办墙报、做饭、放哨,见着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他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采访方便,而是在深厚的阶级感情支配下做这些事的”,在这期间,他“不懈地认真思考与不断地通过短小形式——通讯、报告、短篇小说、短剧,反映部队生活”,^④杜鹏程的成长经历在那一代作家中颇有代表性。

① 陈斐琴:《作者要努力研究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历史和状况》,《解放军文艺》第一卷第五期,第98页。

② (苏)费德林著,曹靖华译,《论中国的新文学》,《人民文学》第2卷第3期,第58页。

③ 傅钟:《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03页。

④ 魏钢焰:《〈保卫延安〉是怎样写成的》,《解放军文艺》1954年12月号,第103页。

中国文坛在 1957 年左右出现了大量的革命历史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文学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实际上,革命回忆录本身也是一种回忆录体的文学创作,“就是介于历史和文学体裁之间的传记《刘胡兰小传》、《把一切献给党》、《志愿军英雄传》,历史纪实的《志愿军一日》以及丛刊《红旗飘飘》中的若干篇章,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读者们把它们当做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革命者的教科书来对待。这些作品出版以后,读者们竞相阅读、互相阅读以至形成了一种时代的风气”^①。1958 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0 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该年 8 月发起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为题的征文活动,号召“解放军现役军官、士兵和转业复员的干部、战士们,拿起笔来,写自己经历过的斗争生活,集体创作一部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 30 年的战斗生活纪实散文集”。^② 1959 年出版第 1 集时,丛书定名为“星火燎原”,后用同一书名在 1966 年前出了 10 集,这 10 集实际上就是 10 个革命历史的小谱系,第 1 集反映的是 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到 1930 年这一期间,红军初创时期的生活斗争面貌;第 2 集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红军反抗反革命军事围攻所作的艰苦斗争,主要是介绍 1930 年底至 1934 年 10 月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反革命大围剿;第 3 集描写的是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经历;第 4、5 集写的是红军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后的活动;第 6 集反映的是 1941 至 1942 年各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抗敌活动;第 7 集写 1943~1944 年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除《星火燎原》丛书以外,还有多卷本的《红旗飘飘》丛刊,这一丛刊从 1957 年 6 月开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1961 年共出版了 16 集,后因回忆录《古城斗“胡骑”》被审查而被迫停刊,《星火燎原》中的某些回忆录将回忆的历史延伸到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第 4 集中的“十月革命回忆录”)、早期中共党员的革命活动(第 5 集中的“革命先烈故事特辑”)。两部规模庞大的丛书以及发表在各大刊物上的革命历史回忆录的问世,一方面建构和完整着革命历史的谱系图,另一方面也促进着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迅速成长,它们“是按照时代编排的各种体裁的回忆录,这是翔实的解放军战斗的光荣史,这也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实践史,这又是激动

^①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 年第 3 期,第 3 页。

^② 沈思:《〈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文的编辑工作》,《文艺报》1958 年第 14 期,第 12 页。

人心的传记文学。”^①另外一方面,这些公开发表的作品对当时刚刚兴起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也起着一种规范作用,即规约着作家们“可写什么和不可写什么”,无形中向作家们暗示着通常所说的“题材禁区”。

《红岩》^②是革命历史回忆录与革命历史小说的第一次完美结合,它是回忆录体文学开始向更正规的文学体裁靠拢并取得成功的范例。《红岩》是其作者继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之后,在同一题材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两位作者解放前曾在国民党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被囚禁过,后来脱险出来,他们曾经在1959年发表《在烈火中永生》。写完回忆录后,他们对手头的创作素材进行了再加工、再综合和再创造,历时七年写成了长篇小说《红岩》。我们将两部作品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在烈火中永生》和《红岩》实际上已经不是袖珍本与扩充本的关系,因为编者、读者的参与,《红岩》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种集体创作的作品。另外,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中,作者致力的目标不同:前者是对经过挑选的史实的忠实记述,在回忆中倾注着作者浓烈的感情;后者对人物事件都经过了一番艺术的想象、提炼和概括,作者企图达到的是另一个目的——完成一幅革命英雄们崇高精神世界的图画,换言之,在完成小说的过程中,作者开始注意到作品的文学性特征,这也标志着革命历史小说写作上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说《红岩》的作者本身就是笔下“革命”的亲历者的话,那么从王愿坚这位未经历过笔下“革命”的作家开始,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家们开始不必再受“非亲历者不能描写未亲历历史”的约束。就写作身份而言,王愿坚具备着写革命历史的“资格”,因为他参加过解放斗争,对战争有着自己的体验与理解;但他笔下的故事,如《党费》(1954)、《七根火柴》(1958)等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都是他不曾亲历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生活。从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发展过程来看,王愿坚对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发展的意义在于:“他选择和表现了一些极可珍贵的、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还接触不多的重大题材”,创造了一批“经过精心塑造和艺术概括的人物形象”。^③他笔下的这些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革命故事,加强和巩固着一个革命历史大谱系的链条。不过也

①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8月号,第10页。

②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

③ 冯牧:《有声有色的共产党员形象——略谈王愿坚短篇小说的若干艺术特色》,《文艺报》1959年第1期,第10页。

有人指出王愿坚毕竟对革命生活经验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着他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后代》就是“从‘老子牺牲儿顶上,哥哥死了弟上前’这个预先设定的主题上演变出来的”,而且“作者写红军长征后老苏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有六七篇。而较成功的却只有《党费》《粮食的故事》等三四篇,比起作者写这些老一辈革命者‘近来的生活片断’的作品(如《普通劳动者》、《亲人》和《休息》),就不是那样篇篇精彩”。^①这也是王愿坚后来放弃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转向现实生活题材写作的重要原因。

王愿坚创作的更大意义在于,从他的创作开始,“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两种叙述者身份和小说叙述方式慢慢开始确立:或由“过来人”和亲历者来讲述亲历的昨天的斗争,从而加强所叙述历史的“真实”;或由“后来人”讲述前辈革命斗争历史的故事。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们无一不是用这两种写作方式书写刚刚逝去的革命历史。而且从王愿坚开始,许多作家开始注意文学的艺术特征,特别是注意借鉴与吸收中外文艺作品的因子,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很多作家认识到“为什么小说写的质量不高呢?我觉得是受了艺术修养的限制,……政治水平、斗争实践、艺术修养对创作这一行是缺一不可的”。^②他们对自身缺点的自觉以及对提高自身素养的强烈要求,也在促进和提高着他们作品中的文艺含量和艺术品格,杜鹏程就曾说过,“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的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③杨沫在写《青春之歌》的过程中,还“认真地补课——认真读了中外名著,认真思考创作规律,认真地反复修改,这才使我的写作有了显著的进步”。^④

第二节 演变:难以超越的内在矛盾

在1958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有论者指出“我们的文学在反映我们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斗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我们的伟大的人民军队

^① 王燎炎:《从情节说起——漫谈王愿坚的小说》,《人民文学》1959年5月号,第125页。

^② 李英儒:《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从创作到修改》,《人民文学》,1960年第7号,第113页。

^③ 杜鹏程:《保卫延安重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修订版,第512页。

^④ 杨沫:《杨沫文集·自序》(卷1),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